

中国应继续用投资拉动经济

许多人总是将扩大投资与转变增长方式对立起来，将促增长与调结构对立起来，其实未必一定如此。

■ 杜建国

最近有许多人反对中国继续用投资拉动经济，理由是中国的工业产能以及交通能源等基础领域的投资已经过剩了。对此笔者不敢苟同。

关于工业产能过剩问题，两个多月前媒体甚至闹出一场风波。5月底，发改委批准了宝钢广东湛江、武钢广西防城这两个1000万吨级的钢铁项目。消息一出，舆论哗然，许多人指责中国钢铁产能过剩，不该再上马新项目。

其实，中国钢铁产能，用“过剩”来概而论之，是非常片面的。目前中国钢铁产能的确定在过剩，但只是集中在低端领域，高端产品依然有很大缺口依赖进口。宝钢湛江钢铁项目不是单纯的产能扩大重复投资，而是进行“减量置换”，即首先在广东累计压缩粗钢产能1614万吨，在此基础上，取而代之的是生产面向汽车、家电等领域的高端碳钢板材类产品，这有助于满足中国对高端钢材的需求缺口。武钢防城项目，也同样遵循了“减量置换”原则，在广西和武钢累计压缩粗钢产能1070万吨的基础上实施。

许多人总是将扩大投资与转变增长方式对立起来，将促增长与调结构对立起来，其实未必一定如此。像两广钢铁项目，就一方面淘汰了落后产能，一方面又新上了先进产能，在促进增长的同时，实现了产业升级和结构调整。这种类型的投资，应该予以提倡。

交通领域也不存在过剩的迹象。

就拿铁路来说，现在许多人指责近年来中国铁路尤其高铁乃是“跨越式发展”，超前了。事实上，中国铁路的发展不仅没有超前，反而是严重滞后于中国的人口规模与经济规模。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研究员梅新育就指出，近几年高铁建设的跨越式发展，其实是在弥补欠账。1990—2010年间，中国GDP从18668亿元上升至401202亿元，增长20.49倍，在此期间，铁路运营里程、旅客周转量等指标增幅不仅远远小于GDP增幅，而且与公路、民航、水运等另外三种交通运输方式相比，几乎在每项指标上都是增长幅度最小。

有好多的人，他们一方面抱怨铁路客运紧张，一方面又反对新的铁路投资；一面写文章呼吁高铁建设和运行速度慢一些，一面又在乘坐高铁时指责去年因故障降速后的高铁太慢了。这很让人费解。

民航方面，2008年首都机场三号航站楼投入使用，我们都觉得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单体航站楼简直是浪费国帑。可不足四年，三号



王利博制图

像欧美有些国家，深陷危机多年，不是不想通过扩大基础投资来拉动经济，无奈财政吃紧，有心无力。目前中国一方面存在推进基础建设的需求，一方面财政充足，制造业和建设施工技术也日趋成熟，必要性和可行性同时存在。对此，别的国家都羡慕得不得了，为何在有些人眼里就成了坏事情？

航站楼就已经不堪重负，以至于必须在北京南郊再建一个新机场。

至于能源投资，过剩也无从谈起。未来中国经济依旧会继续增长多年，对能源的需求自然也同步增长。除了硅基太阳能光伏发电市场

波动较大外，像石油天然气、页岩气煤炭、水电核电风能、苏丹与安哥拉的油田、“荔湾3-1”油气田、海外四大能源供应通道、获得2011年度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特等奖的青藏高原找矿项目，所有这些领域和项目的投资，有哪一个过剩的呢？

基础投资，正因为是基础性的，所以一般相较于其他领域浪费得最少，尤其是对中国这样一个人口、经济、国土规模都同时巨大无比的国家来说，更是如此。不仅广大中西部地区需要进行大量的基础投资，即使东部发达地区，基础建设也还是有很多缺口的。如北京，尽管近10年来地铁运营里程与日俱增，日均客流量已近七百万人次，可仍旧是拥挤不堪。这一问题只有通过新的投资才能解决。

还有人认为发达国家第三产业比重都特别高，中国过分倚重工业和基础建设投资，是落后的象征。其实不然。像美国，底特律汽车工人失业后改送外卖，匹兹堡芝加哥因工厂关闭沦为鬼城，华尔街不支持实体经济去搞坑蒙拐骗，数量庞大的律师吃完原告吃被告，如此一来，其第三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当然会高。可这与其说是先进的表现，还不如说是衰败的象征。即使美国人自己，现在也不认为第三产业比重过高是什么好事情，正在恢复制造业和加大基础投资而绞尽脑汁。

美国自6月份以来，因风暴导

致大面积停电，而众多地区竟然因修复乏力而迟迟不能恢复供电，以至于拖到7月4日，数以百万计的美国人还是只能在漆黑和酷热中度过一年一度的独立日假期。这在中国是难以想象的。早在去年，某次大停电后，有美国人就指出美国现在已沦为“第三世界国家”了。美国第三产业比重远高于中国，但是其基础设施建设如此不堪，我们有理由让中国在这方面去学习美国吗？

像欧美有些国家，深陷危机多年，不是不想通过扩大基础投资来拉动经济，无奈财政吃紧，有心无力。目前中国一方面存在推进基础建设的需求，一方面财政充足，制造业和建设施工技术也日趋成熟，必要性和可行性同时存在。对此，别的国家都羡慕得不得了，为何在有些人眼里就成了坏事情？

另外需要注意的是，扩大投资并不是仅有的选择，除此之外还要配以民生改善，具体说来，这其中应该以提高工薪阶层的收入为重点。当然，某些投资类项目，本身就属于民生改善工程，如大规模的保障房建设等。

7月3日，中国与以色列达成一项备忘录，由中国为以色列修建一条连接地中海与红海的高速铁路，同时承担部分投资。另外以色列也将在油气开采输送方面与中国进行合作。难道中国自己的钱和技术，只能为别人造福，却不能为自己谋利？

贸易顺差 放量增长的纠结

与过去贸易顺差叠加环境下出口与进口的同向增长完全不同，今年以来贸易顺差的增长却是以进口大大慢于出口的形式表现出来，也就是说贸易顺差的“放量”是因为进口的“缩量”而得到了非同寻常的彰显。

贸易顺差增长的同时而经济却倍显疲弱，至少说明仅凭出口拉动经济的力量十分有限或者说独木难支，经济增长必须转移到依赖于消费这一内生性引擎之上。然而，这一令人耳朵生茧的命题能否最终破解却取决于社会财富重新分配的程度和效果。

■ 张锐

持续了数年的中国对外贸易顺差并没有因为全球经济的恶化和外需的钝化而放慢自己急行的脚步。

据海关总署发布的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贸易顺差达689.2亿美元，扩大56.4%，其中6月份贸易顺差额为317.3亿美元，单月顺差额增幅增至三年半以来的最高点。顺差形成的常规机理就是出口大于进口。

数据表明，今年1—6月份，我国实现出口9543.8亿美元，同比增长9.2%；进口8854.6亿美元，同比增长6.7%。在中国经济下行趋势日渐明朗的情况下，出口的显著回升多少让人们看到了经济可能转弱的希望。

然而，与过去贸易顺差叠加环境下出口与进口的同向增长完全不同，今年以来贸易顺差的增长却是以进口大大慢于出口的形式表现出来，也就是说贸易顺差的“放量”是因为进口的“缩量”而得到了非同寻常的彰显。

资料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出口规模在比去年同期增长800多亿美元的同时，进口数量仅增长560亿美元，尤其是6月份的进口额度比5月份锐减140亿美元，其环比大幅下降为近年来所罕见。进口的急剧收缩反映出的是国内经济的疲软与市场需求的萎靡。

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GDP同比增长7.8%，取得了三年来首次“破八”的最新纪录。与经济连连下滑相匹配，国内市场动力煤和钢材价格纷纷创下历史新低，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回落2.4个百分点。

贸易顺差增长的同时而经济却倍显疲弱，至少说明仅凭出口拉动经济的力量十分有限或者说独木难支，经济增长必须转移到依赖于消费这一内生性引擎之上。然而，这一令人耳朵生茧的命题能否最终破解却取决于社会财富重新分配的程度和效果。

资料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财政收入同比增长12.2%，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13.3%，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9.7%。已经持续了10多年的“国富民弱”格局正在不断地得到强化。

有趣的是，在民众收入连连“跑输”财政收入的同时，消费对于经济的拉动作用却日渐式微。资料显示，2001年，我国居民的消费率为62.3%，而如今却下降到了47.4%。结论由此相当清楚，只要国内财富未能得到有效的再配置和民众消费不能得到真实的提振，未来中国的进口需求还将萎靡，由此所产生的顺差还会持续，只不过这种顺差对于促进经济增长能有多大的实质性意义就值得玩味。

必须承认，基于重商主义的“出口导向”和与此相对应的顺差诉求是中国政府沿用多年而且仍在持续的国际贸易政策，这一政策驱动的最明显成效就是实现了中国外汇储备从零到3万多亿美元的数量飞跃。

然而，在国家与国家之间日益追求贸易平衡的全球生态中，特别是在各国经济遭遇金融危机与债务危机重重倾轧的环境下，中国出口的一路高歌和顺差的连年大红大紫却极易引来贸易国的警觉甚至敌视，中国的对外贸易生态环境可能不断恶化。

按照商务部的最新统计资料显示，中国已经连续17年成为遭遇贸易摩擦最多的国家，其中今年以来所遭受贸易摩擦同比增长84%。值得警惕的是，除了欧美等发达国家对我国出口企业频频“亮剑”之外，包括巴西、印度等新兴市场国家挥向中国的贸易制裁之拳也日益凌厉。

据世界贸易组织的统计，在阿根廷发起的反倾销调查中有1/4针对中国产品，而印度近年来对我国反倾销调查立案数量占同期所有世贸组织成员对我国反倾销调查案件总数的1/5。可以说中国出口已经陷入遭人“围剿”的尴尬境地。

当然，屏蔽贸易赤字和实现顺差是任何一个参与国际贸易的主权国家所追求的目标，但这种目标的实现应当建立在公平、公正的贸易往来基础之上。无疑，贸易保护主义的泛滥泛泛起让具有比较竞争优势的中国企业成为屡屡被伤害的对象，但若隐若现的出口政策保护和国内出口企业低端和低价的恶性竞争也成为了他人实施贸易制裁的“把柄”。

为此，中国企业应当通过调整产品出口结构和提升出口产品层级以谋取在国际贸易分工上的再定位。必须明确，受到劳动力成本以及汇率成本驱动等因素的影响，已经越来越“贵”的中国传统劳动密集型出口产品在欧美市场上已经出现被南亚和东南亚国家替代的显著趋势，如果中国企业不能进行及时的产品切换，持续多年的出口红火局面可能难以维系。

但是，如果中国因为调整出口结构而引致出口一定程度的萎缩并进而产生短智贸易逆差则并不可怕。某种程度上而言，贸易逆差不仅可以调节中国贸易盈余和实现国际收支平衡，进而减轻贸易纠纷压力和优化贸易生态，并且贸易逆差从更深层次上体现了中国经济增长方式的切换与转变。扩大机电产品、高新技术产品和绿色低碳产品出口和加大对科技设备与技术的进口是我国优化贸易结构的主要诉求，而且这一良好的生态正折射出来。

虽然今年上半年诸如服装等传统大宗商品的出口步伐大幅放慢，但占我国出口半壁江山的机电产品月增均在10%以上。如果这一趋势未来能够得到延续和强化，中国贸易顺差定会褪掉更多的纠结而变身轻盈。

(作者系广东技术师范学院天河学院经济学教授)

从稳定发展角度看减税



(上接第一版)

在经济危机到来时，最好刺激经济的措施不是政府替企业、替老百姓花钱，而是把钱留给民间，留给企业，让它们有自我增长的基础。

几十年来，供给学派的思想对世界经济产生的影响一直强劲不衰。供给学派反对“凯恩斯主义”的政府

干预经济的思想，主张建立完全竞争的市场经济。在他们看来，政府取得更多税收收入的最佳途径并不是提高税率，恰恰相反，而是减税。减税，社会经济就会繁荣；减税，社会供给就会增加；减税，政府税收收入不但不会下降，反而会提高。美国自上个世纪80年代里根时代就积极奉行供给学派的思想。后来也出现了一股世界性的减税运动，前后有数十个国家，包括东欧和原来隶属于前苏联的部分国家，纷纷推出减税计划和方案，甚至以高税负闻名的法国也宣布降低所得税和增值税的标准税率。

征税人与纳税人的 截然对立

在这个地球上，中国是不多的坚持快速增加税收的国家。中国各级政府很难接受减税的建议。有人说“减税是个馊主意”，理由是国家面临经济困难，经济刺激计划需要钱。

显然，就“减税”本身而言，它作为一种调整纳税人权利与义务的措施，不仅仅在于这个“减税”的称谓和内涵，更在于这个减税的决策主导者是谁，体现的是谁的税收意志。

进一步说，体现的是多少纳税人或公民的意志。

就企业而言，感受到的只是“有增有减”式的税改。“你今天纳的税多些，我明天纳的税少些”、“今天这个税种停征了，明天那个税种又开征了”、“今天这个税种的税率降了一些，明天那个税种的税率又从几级降为几级”，或者“今天这个可以抵扣，明天那个可以抵扣”等等。不管怎样改革，政府的税收总收入总是“有增无减”，而且必须保证年年能够“战略性增长”。

有没有高税收而纳税人却不对立的？现成的例子在北欧，北欧福利国家以高税负著称，但纳税人减税的呼声却低得多。这一方面是因为他们的财政收入在受监督的情况下切实用在了民生上；另一方面，这些国家的政府也自觉地扮演“小政府”角色，使民众不必担心用高额的税负滋养一个不受管束、恣意妄为的政府。这已与财富分配无关，更不是蛋糕做大做小的问题了。

结构性减税 为经济注入新活力

北美殖民地的宣告独立，就是缘起于英国殖民者向殖民地人民的

随意征税。在18世纪后半叶，英国政府在北美殖民地开征印花税和糖税，以转嫁它在战争中的巨额财政亏空。于是北美人宣称英国政府无权向殖民地人民征收印花税，从此便开始了反英独立战争。1781年颁布了《美利坚合众国宪法》，宪法第1条第7款便是有关税收(宪)法定的规定及其具体实施程序。

同样，1789年法国大革命的直接起因亦是由法国国王路易十六课征新税而引起的，而大革命后著名的《人权宣言》中也专门有限制政府任意征税和任意花钱的明确规定条款。

亚当·斯密在1775年就说：“除了和平、轻税负和宽松的司法行政外，把一个最原始的国家发展为最大限度繁荣的国家，就不再需要别的什么了。”

目前，我国企业面临空心化危机，应采取“从宽”的政策予以调整。怎样调整？结构性减税。只有对支撑社会经济健康长远发展的实体经济减税或退税，方可给企业和家庭带来新的活力、激励内需，从而使国家在退一步后，前进两步或争取新的飞跃。

(作者系中国企业研究院首席研究员)